



荆楚文化丛书（史传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 组编

荆楚建制沿革

Jingchu Jianzhi Yange

罗运环 肖雨田 王 准 罗银川 / 著



荆楚建制沿革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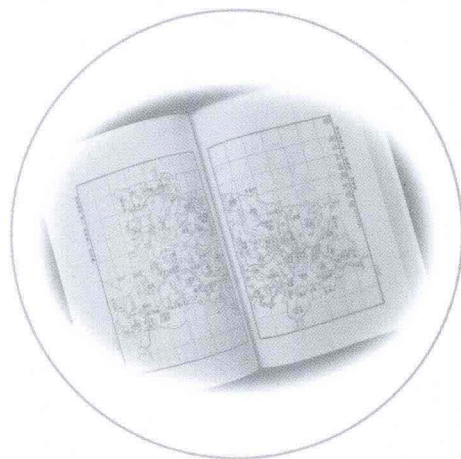
荆楚文化丛书
(史传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本系列主编 / 刘玉堂

荆楚建制沿革

Jingchu Jianzhi Yange

● 罗运环 肖雨田 王 准 罗银川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建制沿革/罗运环,肖雨田,王准,罗银川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12

(荆楚文化丛书/丁凤英主编.史传系列)

ISBN 978—7—5430—7939—7

I. ①荆… II. ①罗…②肖…③王…④罗…

III. ①政区沿革—历史—湖北省

IV. ①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091 号

本书为湖北省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研究基地成果之一

著 者:罗运环 肖雨田 王 准 罗银川

责任编辑:王远彦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6.75 字 数:535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7.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纂委员会

荣誉主任 / 尹汉宁 张 通 章开沅 冯天瑜 熊召政

顾问 / 石 川 王 杰 王峻峰

主任 / 丁凤英

副主任 / 刘玉堂 徐士杰 杜建国 王正强

编纂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凤英 马建中 王正强 刘玉堂 杜建国 李子林

何晓明 罗福惠 徐士杰 彭小华 黄 钊 邹德清

编辑部

主编 / 丁凤英

执行主编 / 王正强 刘玉堂 徐士杰

分系主编 / 刘玉堂 徐士杰

办公室 / 张叶青 田少国 张执均 王平权

许建华 黄朝霞 高兰琴 王文英

序

尹汉宁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拥有重要位置。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数不胜数,悠远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湖北文化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关键是要将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量、转化为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系统研究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中增强文化自觉,为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软实力和 cultural 生产力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荆楚文化丛书》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省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编撰而成。丛书分胜迹、史传、学术、艺文四个系列,每个系列由十卷组成,凡四十卷,约一千二百万字,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史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期望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阅读和学习《荆楚文化丛书》,从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奋力投身建设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绪 论	建制沿革总论	1
-----	--------------	---

上 编 行政建制(上)

第一章	先秦时期	15
第一节	远古至夏代湖北地区的方国	15
第二节	殷商方国与湖北地方政权	17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诸侯封国与分封制	22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与郡县制的出现	24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职官制度	27
第二章	秦汉时期	34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与封国制度	34
第二节	秦汉时期州郡县与封国的职官制度	39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人事管理制度	44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4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	49
第二节	侨置州郡县与地方行政体制	6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职官制度	72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事管理制度	76

荆楚建制沿革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	79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行政区划	79
第二节 再次由两级制走向三级制	84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地方职官制度	87
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人事管理制度	93
第五章 宋元时期	99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划	99
第二节 宋代路制与元代行省制下的地方行政体制	103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地方职官制度	107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人事管理制度	112
第六章 明朝时期	117
第一节 明代的湖广行省	118
第二节 湖广行省“三司”的设置	120
第三节 明代的湖广巡抚	125
第四节 布政司下各府、直隶州	126
第五节 湖北区域的州县	129
第六节 湖广军事体系	134
第七节 湖广藩封体系	139
第八节 明代的鄂西土司	141
第九节 皇帝及中央机关直接的置司派员	145
 中 编 行政建制(下)	
第七章 清朝时期	151
第一节 清初的湖广与南北分省	152
第二节 湖北省级机构与职官的裁省兴置	154
第三节 清代湖北各府、直隶州	157
第四节 清代湖北各州县	159



第五节	清代湖北的军事建制	164
第六节	晚清的湖北建制	171
第七节	清末新政建制	180
第八章	民国前期	187
第一节	民国湖北建制的起点	187
第二节	民国初省制之议与省制改革	191
第三节	湖北分道	196
第四节	湖北县制	199
第五节	湖北的司法建制与警政建制	202
第九章	民国后期	206
第一节	武汉的短期建都	207
第二节	民国后期的湖北省政府	209
第三节	武汉设市	217
第四节	行政督察区	220
第五节	县级建制	223
第六节	县以下的区级行政建制与保甲制度的重新推行	226
第七节	民国后期的湖北司法警政建制	229
第十章	红色建制	234
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的湖北苏维埃建制	235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抗日民主政权	249
第三节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湖北的解放区政权	258
第十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265
第一节	当代湖北省建制的起点	265
第二节	湖北省省府建制	267
第三节	地、市、州建制	282

荆楚建制沿革

第四节 县级建制	288
----------------	-----

下 编 政区沿革

第十二章 武汉市	295
第一节 汉口、汉阳	298
第二节 武昌	301
第三节 远城区	304
第十三章 鄂东南地区	309
第一节 黄石市	309
第二节 鄂州市	313
第三节 咸宁市	315
第十四章 鄂东地区	320
第一节 孝感市	320
第二节 黄冈市	327
第十五章 鄂北地区	337
第一节 襄阳市	337
第二节 随州市	346
第十六章 鄂西北地区	350
第一节 十堰市	350
第二节 神农架林区	360
第十七章 鄂西南地区	362
第一节 宜昌市	362
第二节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375

第十八章 鄂中南地区	384
第一节 荆州市	384
第二节 荆门市	394
第三节 仙桃市	401
第四节 潜江市	403
第五节 天门市	404
后 记	406
地 图	408
湖北政区方位版块图	
秦代湖北设郡图	
西汉湖北设郡图	
三国湖北政区图	
西晋湖北政区图	
唐代湖北政区图	
北宋湖北政区图	
元代湖北政区图	
明代湖北各府(卫)分布图	
1820 年湖北省分道图	
1925 年湖北省分道图	
1949 年湖北省分道图	
2013 年湖北省政区图	

绪论：建制沿革总论

清朝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甲戌(十二),即公历 1664 年 4 月 7 日,湖广布政使司(省)分治,湖北省正式建省。本书总论将由此展开。

一、湖北建省的历史沿革

(一)建省的历史溯源

湖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 200 万年的“建始直立人”时期。湖北建省的历史沿革可上溯夏代以前的“三苗”之域。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代,约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那时,江汉平原的先民筑有多座古城,最大的是天门石家河古城,发现有祭坛、具有文字萌发性质的刻划符号、冶铜遗迹、代表权力象征性质的石钺,应是远古时代末期的一座文明中心性质的古城。

夏代,禹规划天下的土地,定为九州,《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湖北在荆州之域。主要的方国是“荆楚”。^①

商代,在商王朝的“南土”之域。汉水以西主要为“荆楚”之国;汉水以东有商朝据点“盘龙城”。

西周,汉水以西主要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汉水以东多为周王朝的同姓封国,“汉阳诸姬,随为大”。

东周,整个湖北地区逐渐纳入楚的疆域之内。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代,楚国除了拥有今湖北、湖南全境,今河南、安徽大部分地区外,战国前中期楚灭吴后

^①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荆楚建制沿革

还占有今江浙地区及山东西南部地区,其势力范围则扩展到重庆、汉中、岭南及云贵地区,但其中心则在湖北江陵(今荆州市直辖荆州区)以北的纪南城。

战国晚期至秦朝,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278 年)秦白起拔郢,楚都向东北迁至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湖北为秦所有,湖北大部分县属南郡(治江陵,在今荆州市荆州区);西北房县、鄖县、竹山、竹溪一带属益州汉中郡(治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北部属南阳郡(治宛,在今河南南阳),东部秦置衡山郡(治所邾县,在今湖北黄冈市,或说在新洲区)。在这四个郡中只有南郡和衡山郡治所在今湖北境内。

西汉前期,初袭用秦制,后又分南郡、衡山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以衡山郡西部和南郡东部设立江夏郡(治西陵,在今新洲区西)。^①

西汉中期至东汉,汉武帝时分置十三州刺史部,置荆州刺史,今湖北的南郡、江夏郡,以及包括今湖北北部的南阳郡也在其中,鄂西北房县一带仍然属益州汉中郡。刺史部只是督察区性质,东汉末年改为郡上一级行政组织,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组织,刘表首任荆州牧。治所在襄阳(今襄阳市)。

三国时期,魏、蜀、吴争夺荆州,后魏、吴分治,魏荆州治所在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据有湖北偏北的大部分郡县,其中包括新城(今房县)、上庸(今竹山县西南)二郡;吴荆州,治所在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除湖南外,湖北南部的郡县大都包含在其中。

两晋时期,西晋统一后,荆州南北分治的局面结束,西晋时荆州治所起初设在襄阳,灭吴后移治江陵,湖北的郡县大体都在晋荆州之域。东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迁入,开始在荆州域内侨置州、郡、县。

南北朝时期,湖北主要属南朝范围,仍设州、郡、县三级,侨置州、郡、县增多,变更频繁,建制紊乱。其中值得重视的一是南朝宋所设侨置雍州,其治所在襄阳。二是南朝宋孝武帝时,分荆、湘、江、豫四州所置郢州,其治所在夏口(今武汉市),夏口已成为一处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

隋朝统一全国后,于开皇三年(583 年)和开皇九年(589 年)先后对地方行政进行改革,废除诸郡,实行县州两级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又大举并省州县,同时改州为郡。隋开皇九年(589 年)江夏郡曾一度改称鄂州,治江夏,大业三年(607 年)又改为江夏郡(唐武德五年,即 622 年又改江夏郡为鄂州)。经合

^① 参看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9~140页。

并调整,湖北地区除西北部分和东部一隅外,绝大多数的郡县都在荆州(或作“江汉沅湘”)之域。炀帝还一度置司隶刺史,巡察荆州诸郡(或作“江汉沅湘诸郡”)。

唐朝沿袭隋制,改郡制为州制(曾一度短暂恢复郡制)。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分为十道,湖北分属于山南、淮南和江南三道。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增至十五道,湖北分属淮南、江南西、山南东、黔中四道。唐代的道最初为地方监察区,后来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四道中,仅山南道(山南东道)的治所在湖北地区的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唐玄宗末年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内地增设方镇,湖北地区设有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鄂岳观察使(治鄂州,在今湖北武汉)、荆南节度使(治江陵府,在今湖北荆州)三个方镇。这三个方镇一度成为三个政治与军事中心,其中江陵还建为南都。

宋代改“道”为“路”。起初在全国分设十三路,后来逐渐增加至二十六路。在湖北地区设有荆湖北路(治江陵,在今荆州市荆州区)、京西南路(治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淮南西路、江南西路、夔州路。其中荆湖北路、京西南路的治所在湖北地区的江陵和襄阳。南宋初年,岳飞在鄂州驻屯大军,节制京西与荆湖南北路。

元代,在全国设三个中书省、十一个行中书省。起初,行省属于中央中书省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由临时性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湖北地区,长江以南属湖广行省(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长江以北属河南江北行省;西部夔州路、羁縻州属四川行省。其中只有湖广行省省会设在湖北地区的鄂州,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成为政治中心。

明代初,袭用元代旧制,湖北属湖广行省。后改行省为布政使司(省),分全国为十三个布政使司。明代的行省比元代的要小得多。明朝合元代江北河南行省的今湖北省部分和元代湖广行省的今湖南省部分等置湖广布政使司(省),今湖北全境大体属于湖广布政使司(省),治所在武昌(今武汉市武昌)。

总之,远古石家河古城文明中心、两周时期的楚国腹地、东汉末刘表时的荆州、元明两朝的湖广行省,凡此等等均为湖北省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二)省名及正式建省

湖北得名于宋代。北宋初,始以洞庭为界,分荆湖南、北路。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省省名始此。

荆楚建制沿革

明代中期,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以大湖(洞庭湖)中分南北”,即“湖北”、“湖南”两个巡按区(巡察性质的监察区)。明代后期,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以洞庭湖为界”划分“洞庭以北”和“洞庭以南”两个学政区,并分别在省会武昌和长沙府城设立“学道”官署。凡此,均为清代湖南、湖北两省区的划分奠定了基础。

清初沿用明制,置湖广行省。据《清实录·圣祖实录》卷十一载: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甲戌,湖广布政使司(省)分立为左右二布政使司(省)。“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郢阳八府,归湖广巡抚管辖。”康熙六年(1667年),湖广左布政使司改名为“湖北布政使司”。雍正初年,又改“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湖北省正式建省。清代的巡抚就是一省之长。湖北首任“省长”是湖广巡抚刘兆麒。

总之,湖北正式建省在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甲戌(十二),即公历1664年4月7日,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尚书·禹贡》九州之一的荆州之域。湖北省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省。

二、经济中心转移与省会的确定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总部”中论及湖广之形胜云:“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顾氏此论主要是就政治军事形势而言,但他能站在全国的高度,认识到襄阳、荆州、武昌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可贵的。下面将从襄阳与樊城、荆州与沙市、武昌与汉口的发展情况考察湖北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与省会的确定。

(一)江陵的发展及襄阳、夏口的兴起

先秦时期,湖北地区比较明确的中心城市是楚郢都,考古发现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北约5公里处的纪南城遗址,城内面积16平方公里,据推测最盛时可能拥有30万人口。古人有描述曰:“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

衣鲜而暮衣敝。”^①虽有几分夸张,但城内人气之旺,市面之繁华,由此也可见一斑。

战国后期和秦朝时期,秦所设的南郡治江陵,江陵仍然保持湖北地区中心城市地位。汉沿袭秦制而未改。三国时期,魏吴分别设置荆州,其中吴荆州的治所也在江陵。西晋荆州初治襄阳,灭吴后移治江陵。东晋时期,荆州的治所仍然在江陵。到南朝中期,湖北地区共有三个州,其中荆州刺史(治所在江陵)常督荆、湘、江、郢、雍、秦、梁等州诸军事,江陵又一度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湖北地区设有三个方镇,荆南节度使治江陵府(在今湖北荆州),是三个政治军事中心之一,江陵还建为南都,地位尤为突出。

襄阳是由渡口城镇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其北的南阳(治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发达,而襄阳仅为南郡属县,地位不显著,襄阳是随着南阳的衰落而继起的。东汉末年,刘表为荆州牧,据有荆州,以襄阳为治所,首次成为全国最高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其地位渐显重要。魏吴分治荆州时,曹操置襄阳郡。西晋初年一度为荆州治所,灭吴后荆州治所迁江陵。东晋初年,因北方战乱梁州一度借用襄阳为治所。东晋末年,在襄阳侨置雍州,历经南朝宋齐梁三朝的发展,“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②。襄阳逐渐上升为湖北北部的中心城市。唐代,湖北分属四道。四道中,仅山南道(山南东道)的治所在湖北地区的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襄阳遂成为唐前期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湖北地区设有三个方镇,山南东道节度使设在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成为湖北地区三个政治军事中心之一。

今武汉市武昌区,初名夏口,地处江、汉汇合处,地位重要,三国时为军事重镇。南朝宋文帝朝议置郢州时,大臣何尚之指出:“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既有见(现)城,浦大容舫……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于事为允。”^③宋文帝采纳何尚之的意见,分荆、湘、江、豫四州置郢州,其治所在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下辖江夏(治夏口)、武昌(治鄂,在今湖北鄂州)、西阳(治西阳,在今湖北黄州)、竟陵(治长寿,在今湖北钟祥)、随(治随县,在今湖北随州)、武陵、天门、巴陵(分南郡南部立,治巴陵,在

① [东汉] 桓谭:《新论》。转引自《佩文韵府》卷16下,上海书店影印,1983年,第700页。

② [后魏] 酈道元注, [清末]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8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2页。

③ [梁] 沈约撰:《宋书》卷66《何尚之传》,《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98页。

荆楚建制沿革

今湖南岳阳)等八郡。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已成为一处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湖北地区设有三个方镇,鄂岳观察使设在鄂州(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三个政治军事中心之一。

总之,到南朝中期,湖北地区共有荆州、雍州、郢州三个州,三州治所江陵、襄阳、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地区的三个政治与军事中心。其中荆州刺史所在的江陵又是长江中游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到唐代后期湖北地区分设三个方镇,襄阳、江陵、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再度成为三大政治军事中心,但江陵又建为南都,表明江陵的地位还在襄阳、鄂州之上。

(二)经济重心的东南移与汉口镇的崛起

六朝以降,随着农业经济尤其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活跃,一些新的商业市镇,在河流交汇处、渡口、码头原有集镇(或“草市”)的基础之上纷纷兴起。其中以襄阳对岸的樊城、江陵东南江边的沙头市(荆州市沙市区)、武昌对岸的汉口镇最具影响力。

樊城与襄阳本来都是由南北相峙的渡口发展而来,襄阳在汉水之南,重在政治军事;樊城在汉水以北,是汉水中游南船北马的商贸中心。唐宋时期有长足的发展,后来由于南北战争的破坏,及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其发展速度不能与沙头市,更不能与汉口镇相比。

沙头市(今荆州市沙市区)与江陵同处长江中游西段北岸,是南北陆路和东西水道交通的重要枢纽。江陵重在政治与军事,沙市重在商业。沙市是由民间“草市”发展而成,到南宋时,“四方之商贾辐凑,舟车骈集”^①,“大商辐凑,居民栉比”^②,在经济上超越江陵,成为一商业中心。到明清则成为湖北仅次于汉口镇的第二大商业市镇。

汉口镇与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夹江相望,依汉水与汉阳划境。夏口重在政治军事,汉口重在商业。汉口镇兴起于明末清初,明代中期渐有居民,但因后湖水患,商业并不景气。明末,汉口修筑起防御后湖的袁公堤,汉口城区水患减轻而迅速发展,始由盐船集泊分销之处,发展到南北东西商品汇聚之地。到清中

①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64《荆湖北路·江陵·景物下》“沙头市”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2213页。

②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5《淮西帅高君神道碑》,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市镇。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学者刘献廷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汉口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与全国许多省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交往,故汉口有“九省通衢”,全国“四大名镇”等称号。汉口于1861年正式开埠后,外国资本争相抢占市场,进出口贸易超过广州,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以上樊城、沙头镇、汉口镇发展的差异性,体现出湖北南北及东西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地域差异,这是与全国的和湖北本区的经济重心东南移有关。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长江下游地区最先得到实惠。在湖北地区内部也存在经济重心向南、向东南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组成部分,开始于唐中后期,比长江下游略晚,到元明清江汉平原垵田大兴之后,才逐渐完成。约到明代中叶,垵田围垦大盛,人口增多,江汉平原已得到较全面的开发。“湖广熟,天下足”;“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的谚语广为流传,江汉平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重要粮仓。经济东南移的格局业已形成。樊城处于江汉平原以北,且多遭战争创伤,故明清时发展缓慢,沙头市处于江汉平原的西部,南北交通要地,发展较快。汉口镇处于江汉平原发达的东部,且处于江汉合流之处,诸郡顺水,所以最为发达。这些也为政治中心的转移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省会武昌的确定

南朝中叶以前,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的发展落后于江陵和襄阳,从南朝中叶起一直到唐中后期,鄂州已上升为与江陵和襄阳并列的三大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其地位略低于江陵。

宋代,湖北地区分属五路,只有两路的治所在湖北,即:荆湖北路(治江陵,在今荆州市荆州区)、京西南路(治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南宋初年,岳飞在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驻屯大军,节制京西与荆湖南北路,鄂州的地位迅速上升。与此同时,襄阳历经战乱,特别是宋元之际的襄阳围攻战历时八年之久,破坏惨重。